

中西文学文化关系研究丛书

孙 逊 主编

经典的重构

宗教视阈中的翻译文学研究

宋莉华 /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西文学文化关系研究丛书

孙 逊 主编

经典的重构

宗教视阈中的翻译文学研究

宋莉华 /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典的重构：宗教视阈中的翻译文学研究 / 宋莉华
主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5

(中西文学文化关系研究丛书)

ISBN 978-7-5325-9155-8

I. ①经… II. ①宋… III. ①宗教—影响—文学翻译
—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I04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48833 号

中西文学文化关系研究丛书

经典的重构：宗教视阈中的翻译文学研究

宋莉华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o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375 插页 2 字数 286,000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9155-8

I·3364 定价：52.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典小说西传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7ZDA265)。

前 言

宋莉华

宗教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几乎与人类文化同时产生和发展,并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是构成中外文学特色的重要方面。翻译是在特定语言文化环境中对原著的改写与重构。近年来在翻译文学研究领域,宗教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开始受到翻译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学术研究的前沿课题。本书旨在拓展翻译文学的研究领域,通过讨论宗教对翻译文学的介入与影响,推动文学与宗教的跨学科研究。本书力图打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宗教与文学的界限,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

一、宗教与翻译文学的兴起

从中西方翻译的历史看,翻译的兴起与宗教密不可分,翻译文学发端于宗教典籍的译介,早期重要的笔译活动几乎都是对宗教典籍的翻译。中国历史上,早期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大多与宗教传播有关,并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南北朝以降,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无一不受到汉译佛典的影响。从西方的翻译历史看,哲罗姆(Jerome, 340—420)用拉丁文翻译的《圣经》在很长时间内被奉为典范,以致1408年的阿伦德尔法令明确规定:禁止任何人用任何语言再翻译《圣经》。拉丁文成为宗教的

“官方语言”。翻译的历史就是一部文学革新的历史，也是一种文化赋予另一种文化权力的历史。李奭学指出，以往我们只知道近代中国文学始自清末，殊不知清末文学的新气象实发端于明末，可以上溯到明末耶稣会士的翻译活动。在中国出现的第一部欧洲传奇小说，第一本有关欧洲修辞学的专著，第一首译成中文的英诗，第一部译介到中国的欧洲灵修小品文集，全都出自耶稣会士之手。利玛窦的《二十五言》是第一部译介到中国的欧洲宗教经典，其言体和语体，几乎同为晚明盛行的文学体裁，此后以“言”作为书名的文学译述之作迭起。

宗教翻译固然是代圣人立言，但是一旦涉及语言文字，就必然受制于语言活动的规律制约，不可避免地受意识形态、赞助人的利益以及对语言文学的普遍的看法、诗学规范等的影响，其翻译活动又会反过来作用于文学。蒋哲杰对道安的佛典翻译与哲罗姆的《圣经》翻译的比较研究，深化了对宗教翻译活动的认识。早期来华传教士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借助文学手段，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确立基督教信仰的有效性。传教士注意到欧洲与中国在文化上的差异，故而在中国的传道形式更注重依赖叙述故事，重在通过事理而非理论，进行潜移默化的熏陶与和风细雨的教化。传教士认为，适合中国人的福传方式，不是让基督教信仰以欧洲的形式，即以论证的方式或者说是神哲学的形式传播，而是通过对《圣经》原本的叙述。《圣经》一旦借助翻译进入中国人习惯的叙述传统，那就不仅是一次文化的融合，而可能是一种新文化的诞生。顾钧通过考察早期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发现，他们对中国古老的文学表现出兴趣，在译介上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以此作为文化会通的桥梁。其中娄理华(Walter M. Lowrie, 1819—1847)的《诗经》译介与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 1812—1884)的《聊斋》译介尤为值得关注。

二、宗教与文学经典的重构

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还是涉及政治、历史、宗教、伦理、文艺等多个领域的复杂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在另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环境里的改造、变形或再创作。

17—18世纪的耶稣会士来华之后,积极致力于翻译儒学典籍并在欧洲刊行其译著。罗莹考察了清初来华耶稣会士的三个《中庸》译本,揭示了这些译本对中国文化的内在理性表现出肯定和欣赏;同时,在中西礼仪之争的大背景下,加之面临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对耶稣会在基督宗教信仰原则以及译名问题上的指责,耶稣会译者基于自身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又努力地证明自身的宗教和文化立场以及传教策略的合理性。如果说耶稣会士凭借着圣保禄式归化异教徒的热情以及对于中国文化“同情之理解”,尚能透过“非理性”的表象,如祭天祭祖、八卦算命等现象,发现中国文化中的内在理性,那么18世纪以后的西方人则更多以外在理性的缺乏,来否定中国文化的内在理性。如何主动面对西方,及时回归传统,通过经验总结及理论反思,建设一个既中国又现代、既有别于西方现代主义模式又具备普世价值的中国学术传统以及现代中国形象,已成为学界当下的重任。在这方面,来华传教士对《孟子》以及其他中国典籍的翻译,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作为一部儒学经典,《孟子》在西方的译介已经超过400年。《孟子》的祖西之路是由耶稣会士开辟的,但当时仅限于在来华传教士中流传。韩振华对19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柯大卫、理雅各、花之安等人的《孟子》译本进行梳理,发现了译本中的一些新特点,他们在拉丁文之外,用英、法、德等语言译介《孟子》,使其在西方社会走向大众。作者将重点放在宗教思想史的考察方面,研究并“解码”西人的接受语境、问题意识,以及视域融合的具体表现,并尝试作出

自己的价值评判。理雅各作为中国经典翻译的集大成者，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直是典籍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丁大刚在总结前人研究理雅各典籍翻译的基础上，提出典籍翻译研究的译者话语视角，以及以译本比较分析为基础和以跨文化阐释为指归的方法论。他指出，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翻译使基督教与儒家思想在碰撞与融合中，各自产生许多新的意义。理雅各以基督教思想改写儒家思想，重构了中国典籍的意义，同时也对基督教思想自身构成了改写，这与宋明理学“援佛入儒”的诠释策略并无本质的不同。

三、宗教实践与文学翻译

《圣经》本身具有很强的文学性。19 世纪以来，《圣经》研究领域发生的重大变革之一，就是对《圣经》的文学性研究日趋加强。19 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文学家和批评家之一马修·阿诺德 (Matthew Arnold, 1822—1888)，就提出了文学性的《圣经》诠释方法。他从《圣经》语言的性质入手，细致探究了《圣经》话语的情感性、想象性和隐喻性品格，确立了与此相应的文学释经方法。同时，西方神学自身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科学理性对宗教产生了巨大压力，文学性的诠释方法成为宗教人士努力的方向之一。西方神学进入中国时又面临文化的隔阂问题，也需要借助文学的手段来传播。本书中《隐喻亦实际：《圣经》“身体”隐喻的解析》一文，着重探讨了《圣经》中神与人的关系，指出透过隐喻系统，《圣经》的读者被引入神人关系的体验中，认识其中隐喻的核心，解析并传递信徒信仰的内涵。

明清之际，伴随白话小说的兴盛，白话在汉语书写系统中逐渐扎稳了阵脚，但相比当时占据主流的文言，仍旧只是细枝末流。几乎同一时期，耶稣会士梯航东来，为此后绵延数世纪之久的中西文化碰撞与融通拉开了大幕。受范礼安影响，耶稣会士入华之初即

研习汉语言文字,著书立说,广传教义,耶稣会故此以“书教”闻世。为博取文人士大夫的青睐,早期入华会士著译往往诉诸文言。不过,白话书写作作为向平民传教的利器,其便利性并未被传教士忽视。早在明末,葡萄牙耶稣会士罗儒望的《天主圣像略说》(1609)、《天主圣教启蒙》(1619)等文献即用白话编著,首开来华传教士白话书写的源头。及至清代中叶,在华耶稣会内的白话书写仍不绝如缕,冯秉正的《盛世刍尧》、贺清泰的《古新圣经》等巨著不断丰富着白话书写的形式与表现力。迨至清末民初,耶稣会白话书籍与报刊陆续问世,最终与晚清新教传教士的白话书写实践、清末白话文运动、五四白话文运动交汇,合力促成了中国近代书面语系统从文言到白话的重大变革。这一变革并非五四学人振臂一呼的结果,近年来关于清末新教传教士的白话实践研究成果颇多,逐渐丰富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知。值得注意的是,天主教传教士的白话翻译与白话创作实际上远在新教传教士之前,目前的研究却少有论及,郑海娟对晚明至清末天主教传教士的白话书写实践进行了梳理,讨论这一涓涓细流如何蜿蜒不息,为汉语书面语系统的现代变革提供了有效的经验和丰富的语汇资源。

李蓓蕾关于黑人灵歌的研究,为考察宗教实践活动与文学写作的关系提供了样本,具有独特的价值。黑人灵歌是美国非裔珍贵的文化遗产和伟大的艺术创造,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宗教与艺术价值。由于长期受到主流社会的忽视和贬低,其多方面的价值亟待客观评估和充分发掘。黑人灵歌不仅讲述非裔族群史诗般的生命历程,凝缩其生活的记忆,表达其宗教信仰与情感,同时传承该族群的文化与精神特质、展现其纯善高贵的灵魂世界,并彰显其艺术创作的天赋予能力。黑人灵歌是宗教仪式、民间艺术与非裔族群的生命体验的完美融合,既包含美国非裔对《圣经》的独特阐释,也包含他们对生命、正义、自由、爱、尊严等人类核心价值的解读,不仅是美国非裔艺术家们的生命之歌,更是整个族群的历史

之歌。黑人灵歌风格质朴、富含隐喻、凝缩情感，其戏剧性所产生的艺术张力极大地拓展了文本的阐释空间，体现了艺术与宗教的有机互动。

四、宗教、翻译与社会的现代转型

翻译研究不仅是比较文学，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基础。翻译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转型的关键时期曾经发挥过独特的作用，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本书第四编通过对晚清来华传教士的文学翻译及写作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受到的异质文化的影响。

左维刚、吴淳邦研究了晚清翻译小说《五更钟》的文学和社会意义。该书译自托尔斯泰的小说《行在光中》(Ходите в свете, пока есть свет. Беседы язычника и христианина)，由美以美会传教士亮乐月(Laura M. White, 1867—1937)与陈春生(1868—?)合译。小说《五更钟》“增润者十有七八”，是对托尔斯泰原著改写的结果，也是该书通过译述实现本土化的过程。与晚清的很多译述小说一样，《五更钟》在成书前有西文底本作为参照，但对原著又不作句对句、节对节、章对章的对应直译。在书写的过程中，该书保留原著中的基本人物，袭用原著的主要故事情节，又在本土化的译述过程中，采用创造性的译述策略，对原作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扩充改写，增加了不少故事，情节也更加丰富曲折，出场人物人数更多，人物形象更为丰满。《五更钟》“处处均须为华人立言”，使这部“专为传道于华人而作”的基督教宣教小说能更好地为中国读者接受，成为中国的《天路历程》。同时，译著中穿插了清末中国的历史事件，赋予了小说新的内涵，借基督徒之口，抨击了妇女裹足、重男轻女等社会顽疾，表现了试图营造社会新风气、改良社会的意图。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女性作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 1819—1880)的两部小说《织工马南》(*Silas Marner*)、《罗慕拉》(*Romola*),也分别于1913年、1917年由亮乐月译介到中国,题为《马赛勒斯》、《乱世女豪》。这两个早期传教士译本带有明显的基督教化倾向。《马赛勒斯》通过删节、概述甚至刻意误读等方式,强化作品的基督教色彩,将小说改造成一部宗教寓言,使其与原著的人本主义思想有很大出入,体现了宗教对文学翻译的操控。译者甚至不惜为抬高自身所属差会地位,进行与原著背道而驰的改写。该译本还对儿童给予了女性特有的关注,显示了性别意识与宗教因素对翻译的双重干预。译著凸显了女婴的形象及其对灵魂的救赎作用,以基督教的儿童观重新定位儿童的社会地位,有助于推动近代中国儿童观念的转变。亮乐月的翻译具有明显的现实指向性,它反映了近日来华传教士试图借助文学翻译传播宗教思想,对处于剧变中的中国近代社会进行基督教的引导,以确立基督教信仰的有效性,促使其被中国社会广泛接受。《乱世女豪》则凸显了基督教内涵与道德训诫意图,译者亮乐月对故事和人物重新进行了演绎,重点展现了女主人公皈依基督教的心路历程,把她塑造成一名凭借上帝的恩典救民于乱世的女中豪杰。同时,译本包含了以古喻今、以佛罗伦萨隐喻近代中国社会的寓意,通过演绎佛罗伦萨作为世俗之城与上帝之城的双城记,试图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提供基督教化的路径。

1895年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发起小说征文,“求著时新小说”,率先发出了对新小说的呼唤,以抨击中国社会存在的三种时弊,即鸦片、时文和缠足:

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

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务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袭旧套。立意毋尚希奇古怪，免使骇目惊心。^①

傅兰雅不仅看到了小说“感动人心，变易风俗”的力量，而且进一步延伸了小说的功能，将之作为批评社会弊病的良方，提升了小说的社会地位，被认为是清末第一次小说革命。^② 应征的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由早期华人基督徒作家所写，《道德除害传》便是其中的一部。《道德除害传》在体例上具有中西叙事诗学的特征，内容上带有神魔小说的特点，并体现出的中西宗教、文学的交流与渗透。《道德除害传》对社会时弊的针砭，较之于同时期的其他小说更为犀利，对新小说及清末谴责小说的兴起，具有一定推动作用。

本书作者来自比较文学、宗教学、海外中国学等多个研究领域，均为近年来在宗教对翻译文学的影响研究方面有所建树的学者。2014年6月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召开“经典的重构：宗教视阈中的翻译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本书为此次会议讨论的成果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这一课题的最新进展。今汇编成册，供学界切磋，以推进此项研究。

① 傅兰雅：《求著时新小说启》，初载于《申报》1895年5月25日。后刊载于1895年6月《万国公报》第七十七册、1895年7月《中西教会报》复刊第七册。

② 孙晖：《傅兰雅与清末第一次小说革命》，《古籍新书报》2011年2月28日第102期；陈大康：《论傅兰雅之“求著时新小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潘建国：《小说征文与晚清小说观念的演进》，《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目 录

前言	宋莉华	001
----------	-----	-----

第一编 宗教与翻译文学的兴起

中译第一本欧洲宗教经典：浅谈利玛窦的《二十五言》	李爽学	003
“中心文本和中心文化”：论《圣经直解》对福音书的节译和 “直解”	高胜兵	029
从文化会通看宗教经本意译合法性的论争：以道安与 哲罗姆为例	蒋哲杰	053
美国传教士与中国文学的最初接触	顾 钧	073

第二编 宗教何以重构经典

十七、十八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对于《中庸》的译介及出版	罗 莹	089
“他乡有夫子”：十九世纪新教传教士的《孟子》诠释	韩振华	115
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研究的几个维度和方法论思考	丁大刚	135

- 托尔斯泰经典的重构改编：陈春生《五更钟》的本土化
译述策略研究…………… 左维刚 吴淳邦 150

第三编 宗教实践与翻译

- 汉语神学的滥觞：利玛窦的“帝天说”与上帝存在的证明
…………… 纪建勋 189
- “书中有舌，如获面谈”：明清耶稣会士的汉语白话书写
…………… 郑海娟 213
- 为了真正的解读：美国黑人灵歌的翻译与研究 …… 李蓓蕾 232
- 隐喻亦实际：《圣经》“身体”隐喻的解析
…………… 郭韵璇 欧秀慧 周复初 250

第四编 宗教、翻译与社会的现代转型

- 从《罗慕拉》到《乱世女豪》：传教士译本的基督教化研究
…………… 宋莉华 281
- 《意拾喻言》：《伊索寓言》从证道喻言到童蒙读物
…………… 宋莉华 298
- 《清末时新小说集》与中西文学关系个案研究：以《道德
除害传》为中心 …… 姬艳芳 313
- 《圣经》故事类图书在华出版状况研究(1999—2014)
…………… 侯朝阳 334

第一编

宗教与翻译文学的兴起

中译第一本欧洲宗教经典： 浅谈利玛窦的《二十五言》

李爽学

一、《二十五言》成书的时间

在中国宗教思想史上，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一生最为人知的著作应属《天主实义》。此书刻于1603年，但利玛窦早在广东韶州传教时便已动笔开写了。学界另有一说：书中内容定稿于南昌，多为利氏作客庐山白鹿书院之际，应当地士子——尤其是白鹿书院院长章潢(1527—1608)——之问回答而成^①。此所以书中特设“西士”与“中士”的对答。学界此说若然，那么利玛窦起心动念，想要中译爱比克泰德(Epictetus, 55—135)的《道德手册》(Encheiridion)，最晚必然在1595年他犹在南昌的时代。我如此立论，绝非信口开河，而是《天主实义》中著名的人生如舞台之喻，早在王肯堂(1549—1613)1602年(万历壬寅年)所作《郁岗斋

^① 夏伯嘉：《利玛窦与章潢》，见田浩(Hoyt Tillman)编：《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第727—745页。另见罗光：《利玛窦传》，见《罗光全书》(42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第8册，第68页、第81页。《罗光全书》以下简称《全书》。